

推动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创新发展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

马一德

智慧。

提供有力支撑。

知识产权制度功能的自主创新：打通创新链条的关键环节

知识产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围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设计、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知识产权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智慧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在价值理念、作用机制和治理方式层面实现了对传统知识产权范式创新超越。面对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加速演进的新形势，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推动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知识产权自主知识体系从构建到完善的转变。

由私权保护到公共福祉提升：知识产权价值理念的重要突破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传统知识产权话语体系单纯强调私权保护的局限性，提出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知识产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知识产权在我国的发展定位，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我为主、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保护”，强调“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领导我国知识产权价值理念实现自主突破、服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构建了一套以私权保护为核心、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知识产权话语体系，通过《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国际条约，形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支配性规则。从表面上看，在这套私权保护机制之下，各国创新者均可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从而激励和培育创新。然而，这套貌似平等的规则忽略了先发者与后发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创新层面的现实差距和知识获取的不同诉求。立法赋予的垄断权，使自由流动的知识被纳入私人财产权范畴，高额垄断利润从知识贫乏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到知识富有的发达国家，先发者与后发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不断扩大进而导致“低端锁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获取诉求在制度设计中并未得到充分考量，在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公共危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超越了将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关系简单处理、以私权保护为单一取向的理论局限，在全面发展的整体视角下阐释知识产权制度的复合价值属性，确立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在主权范围内，根据国家发展阶段和现状，合理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水准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创新激励平衡的理念。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旨在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将知识产权从单纯市场工具提升为国家战略资源，将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着力点由私权保护转向公共政策实施。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体现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人类福祉并重、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价值立场。

这种价值立场不仅体现于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也构成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重要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坚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开放包容原则要求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不搞单边主义、以大压小，以多边对话形成治理共识；平衡普惠原则强调知识产权作为私人财产和公共财富的双重属性，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要协调好本国利益、他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推动广泛合作创新和普遍繁荣。这种多元开放平衡的取向，开辟了知识产权理论研究的新境界，也为全球治理体系创新贡献了中国

正确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能更好保护和激励创新，有助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发挥好国家在重大科技创新中的组织者作用，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制度体系来支撑和保障创新活动。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激励和保护创新的核心制度安排，只有充分对接国家创新战略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突破传统私权工具的狭义定位、深度融入并服务国家创新战略全局提供了思想与行动指南。

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植根于市场经济，构建了一套通过授予“私人垄断”以激励创新的机制，认为市场是创新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然而，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机制并非万能。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专利丛林”“专利常青”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创新步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重大创新攻关日益倚重大型科研设施与大规模资源投入，单纯依靠市场化机制往往难以高效整合不同创新力量并引导其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等等。

针对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日益暴露的市场失灵、创新迟滞及其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等方面的缺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和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性、功能性重塑与升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定位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地融合了国家战略牵引、新型举国体制的资源统筹与市场经济活力，成功发展为连接国家战略目标、有组织科研攻关与市场化创新力量的关键桥梁和核心纽带。这一功能定位确保知识产权既能有效激励和保护创新，又能精准对接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需求，引导创新要素向关键领域集聚。

我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对经营主体创新积极性的激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要加快新兴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陆续修订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力度，加强对经营主体的法律保护。同时，知识产权金融创新不断发展，如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保险等工具不断推出，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得到充分释放。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3件，是10年前的2.4倍。2024年底公布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16.8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04%，充分展现了制度激励与创新活力的正向互动关系。

我国高度重视发挥知识产权作为连接市场与科研力量的桥梁功能。在坚持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和整合关键科技创新要素开展协同创新，从而有效克服经营主体与科研机构缺乏协同、分散创新的局限。通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与保护所形成的激励和引导机制，吸引优质的市场创新资源主动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接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的重要论述，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功能不再局限于保护已有创新成果，而是前移至创新源头，积极服务国家创新战略全链条。从国家实验室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到新型研发机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设计；从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激励政策，到国际科技合作知识产权共享机制，知识产权正成为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关键变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

知识产权治理方式的自主革新：构建系统协同、全链条治理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知识产权治理的复杂性，提出了全新的治理理念，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覆盖领域广、涉及方面多，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加强协同配合，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这一重要论述超越了“司法主导”与传统“政府管控”的二元对立，为知识产权治理方式创新指明了方向。

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治理主要依靠司法主导，通过私人权利救济方式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了以法院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救济成本高、周期长，也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知识产权治理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我国知识产权治理形成系统协同、全链条治理的独具特色的治理格局。

强化顶层设计与组织体系统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和加强党对专利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顶层设计，先后印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等重要文件，明确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国务院建立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体联动机制。

推动形成系统协同、社会共治的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信用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等社会治理方式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应用，健全知识产权工作协同推进机制，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区域协作、社会共治。比如，在电子商务领域，平台企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开发智能识别系统主动防控侵权行为；在版权领域，短视频平台与内容创作者共建正版内容生态，极大提升了侵权治理效率。

构建全链条、全周期的专业治理体系。一方面，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建设，构建了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牵引，北京、广州、上海、海南自由贸易港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29个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重点，地方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支撑的专业化审判体系；另一方面，行政执法实现网格化管理，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推动保护关口前移。同时，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等机构蓬勃发展，为企业创新全周期提供支持。

新时代以来，治理方式创新助力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注册商标数量等多项指标均稳居全球第一，截至2025年6月，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501万件。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三十四位上升至2025年的第十位，是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30位的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知识产权话语体系层面，西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中国知识产权自主知识体系，增强我国知识产权的国际话语权 and 影响力，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立足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实践，及时将成功的做法系统总结为中国经验，并将其凝练升华为中国理论，进而构建起一套既植根于中国大地又融通中外的中国知识产权话语和叙事体系，推动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富有世界意义的知识产权理论体系，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行动指引，为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洗碗越多，摔碗越多”，这种被称为“洗碗效应”的现象，反映了干事创业中的一种情况——干得多，出错的概率也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强化责任约束的同时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探索就有可能失误，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洗碗越多摔碗的几率就会越大。”破除“洗碗效应”，必须坚持“三个区分开来”，精准容错纠错，打消党员干部的后顾之忧，更好激励担当作为。

如何对待产生失误与出错的同志，既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生命，更体现党的作风和形象。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红四军第二纵队到达江西寻乌，针对当时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七条干部管理教育方法，其中一条就强调“说服教育重于惩罚”。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就是在不断容错纠错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壮大起来的。正是因为我们党有着博大的胸怀，才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千革命如此，搞建设也是这样。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前方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许多未知领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事实表明，干事业、谋发展总是有风险的。要求每一项工作、每一次探索尝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倘若不分情况、不分性质，对产生失误的同志搞“一刀切”，甚至“一棍子打死”，不仅会挫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会助长“履行本职懒作为，开拓创新不敢为，分外之事不愿为”的不良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工作中出现过错在所难免。关键在于不能匆忙下结论、扣帽子、打棍子，而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个区分开来”就深刻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

破除“洗碗效应” 更好激励担当作为

中国华

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进一步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对于那些积极作为、出了问题又主动补救的干部，应当给予宽容，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力量，把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拧成一股绳。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改革创新，走的经常是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免不了要碰别人没有蹚过的河，偶尔走些弯路、出现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容人之过，最需要的是担当，需要上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敢于站出来说话公道话，敢于摆事实、讲道理，面对出现失误的人和事，认真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统筹好追究问责和容错纠错工作，不能在基本事实未查清之前、在未经规定程序的情况下就“一免了之”，搞追究问责泛化、简单化。如果那样，就会让“多干多犯错、少干少犯错、不干不犯错”的庸俗哲学大行其道，让“慢作为、不作为、不敢为”的风气潜滋暗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组织给撑腰，干部干事创业才有底气。容错，对常人而言是一种修养，对领导干部来说更是一种担当。这种担当，既是对事业的担当、对党的忠诚，也是激励广大干部抱着“洗碗”、不怕“摔碗”的动员令，激励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更好担当作为。



从“摊大饼”转向“精耕细作”

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汪仲启

城市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城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为我国城市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内在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这一主线，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更好推进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改革开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地方出现了城市无序扩张、粗放型发展等“摊大饼”问题。如今，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这要求我们改变粗放外延式的城市发展模式，推动城市发展从“摊大饼”转向“精耕细作”。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本质上就是在科学划定的开发边界内，以集约高效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让城市更宜居、更宜业，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牢牢把握目标定位，以人民城市理念引领人民城市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深刻阐明了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如果片面推动“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过于注重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建设，对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就会回应不足。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必须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将人民放在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重要评判标准。聚焦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合理安排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比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充分考虑群众的居住、出行、教育、医疗等需求，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服务，让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把人民作为城市建设的主体和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鼓励群众参与城市建设和治理，做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坚持正确发展导向，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质量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能走出一条新路”。如果城市发展方向出了问题，盲目追求扩张规模、扩大城市面积、增加人口数量，对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不够，这种发展就难以持续，还会带来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城市发展以“质量效益”为导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必须更加注重城市发展的内在品质，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绿色低碳智慧发展。培育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增强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同时，注重提升文化、教育、科技等软实力，不断优化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生活质量，让城市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家园，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大力增强发展动力，实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城市发展初期，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推动实现城市较快发展。但随着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要素驱动的发展动力逐渐减弱，城市发展迫切需要转换动力机制。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深刻把握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力的内在要求，做好改革创新大文章”，这就要求我们将城市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深化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城市发展开辟新空间。为此，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吸引和培养创新人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强化城市治理创新，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智能化水平，让城市运行更加高效、便捷、安全。培育创新文化，鼓励尝试、宽容失败，让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文化底色，激发城市发展内生动力。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以特色引领促进提质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产业基础。如果城市发展只是模仿复制，割断城市文脉，缺乏自身特色，就会导致“千城一面”。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必须充分体现城市特色，以增强城市特色引领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建设、治理都应当因地制宜、遵循规律，注重充分利用禀赋优势，制定个性化发展战略。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保留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城市特色、建筑风格等“城市基因”，打造独特的城市风貌，发展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例如，一些历史文化名城通过保护和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既赓续了城市文脉，又促进了经济发展。要以增强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转变。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